

汪朝光 著

影艺的政治

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YINGYI DE ZHENGZHI
Mingdao Dianyng Jiansha Zhiidu Yanjiu

中华史学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华史学丛书

影艺的政治

汪朝光
著

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汪朝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

(中华史学丛书)

ISBN 978-7-300-17835-6

I. ①影… II. ①汪… III. ①电影影片-检查-制度-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8790 号

本书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 (第五期)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 (J50106) 的资助

中华史学丛书

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汪朝光 著

Yingyi de Zhengzhi Minguo Dianying Jiancha Zhidu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2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YINGYI DE ZHENGZHI

Minguo Dianying Jianshe Zhidu Yanjiu

前言

在作者写作本书的前言时，正值美国影片《被解救的姜戈》在中国的公映因为“技术原因”而被叫停，从而引来众多影迷的关注和评论。而无论是什么样的“技术原因”，或许是技术方面的“技术原因”，也或许是艺术方面的“技术原因”，又可能是内容表现方面的“技术原因”，都不无形象地说明了电影在大众层面所能引发的反响可能远胜于其他的艺术形式，也为本书所论述的主题——电影检查，提供了某种现实的呼应。所谓以史为鉴，或许我们正可以从过往的历史中，为认识和理解当下的现实有所参照。

电影是我们唯一能够知晓发明时间的艺术形式，并且在其诞生至今刚刚 100 年出头的历史中，以无与伦比的方式，从广度和深度各方面，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艺术欣赏的愉悦，更在于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乃至我们对世界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认知。正是因为电影真实、丰富而生动的形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其对受众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在电影诞生后不久，对电影影响力的正面或负面的效应评判，对电影是否应该进行检查，以发扬其“正面”意义，限制其“负面”意义，便成为电影界、舆论界以至社会各界历久不衰的话题，并常常引发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又使这个问题往往不再局限于电影的层面，而上升为社会的、政治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对电影应该有必要的检查成为多数共识，而以什么标准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具有强制性还是指导性，如何将其运用在电影放映的实际，则又成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电影检查规则和不同的实现形式，至今我们也很难以某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在这个多元化世界中的不同电影检查规则和实现形式的“好”与“坏”。

电影进入中国的时间几乎与其发明是同步的，而在电影进入中国之

后，从放映到制作的产业成长历程，与世界各国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在近代中国颇为艰难的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电影产业的发展与其他现代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比，却是比较顺风顺水，难得地保持了基本向上的势头。还在 1920 年代中期，中国的电影产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都市电影市场的成长也不遑让于其他的经济文化大国。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电影检查在中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出生背景和表现形式与其他电影大国相比，有同有异，而其最具“特色”的方面，是对电影道德题材表现的非常关注、对武侠神怪影片的严厉查禁以及对外国“辱华”影片的高度敏感，这些当然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和近代以来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的，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讨论。

作者的历史研究，其实更多地集中在民国政治史领域，不过因为作者也算是个资深而真正的影迷，看过无数的中外电影，便在娱乐之余，也对与电影有关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作者不揣冒昧，开始从事一些与电影历史相关的研究，而又集中在民国时期电影检查的主题。作者于电影历史研究应该算是后来者和门外汉，研究的历程也有许多难言的艰辛，好在总算能够坚持下来，并且有了一定的成果，从而有了本书的出版。

本书的各章节，曾经作为研究论文在不同的刊物发表过，此次在结集出版的过程中，作者根据新的资料和新的认识，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和增补。但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所限，这些修订和增补仍然是不完全的，只能留待以后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或可进行彻底的修订乃至改写，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而得以不断成长与完善的吧。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关注、支持、鼓励、帮助，他们或提供稀见珍贵的资料，或帮助获取可贵的研究信息，或不吝真诚地批评指教，使得作者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研究的不足。作者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者兼职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民国电影史料的收藏机构，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都对作者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给予许多支持，使得作者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中国历史学和电影学研究的代

表性学术刊物《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电影艺术》等，宽容地对待作者研究的不足，使作者的不少研究成果得以先行面世，并接受学界的批评。所有这些，对于作者起初貌似“外行”的研究得以走向“内行”并最终得到学界的认可，推动电影史研究的史学化，起到了各自所能起的重要作用，对此，作者诚怀感激之心，并表衷心谢意。至于研究中的种种不足或讹误之处，自然应由作者承担全部的责任。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决定出版这样一本未必能够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著作，本书的策划、编辑、设计人员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精心编校，费力多多，作者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

电影史研究在中国学界仍然是有待大力发展并有广阔空间的研究领域。作者亦有意在未来的岁月中，在电影史研究领域继续有所开拓，有所贡献，有所成绩，并望得到学界同仁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批评。

汪朝光

2013年4月于东厂胡同一号

目 录

民国电影检查之滥觞

- 北京政府时期电影检查的酝酿实行 1

国民政府统一电影检查制度的建立

- 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 27

电影检查制度的地方实践

-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 52

美国电影在华境遇的改变

- “不怕死”事件的前后经纬 74

“革命”语境下的地方电影检查

- 以汉口法租界电影检查为例 92

地方边陲的电影检查

- 哈尔滨电影检查 99

电影检查权的转移

-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建立 110

电影检查制度的延续与调整

-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电影检查 140

“新”旧杂陈

-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 150

电影检查体制的复归与消亡

- 战后的电影检查 174

- 参考文献 197

民国电影检查之滥觞

——北京政府时期电影检查的酝酿实行

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广受欢迎于20世纪。由于电影的现实性、幻觉性、逼真性及其时空扩展的无限性，电影银幕展现的大千世界可谓无所不包，对观众的影响因而更为直观与形象。正是由于电影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各界对电影的关注远远超过他种艺术形式，并往往越出纯艺术范畴之外，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风俗背景密切相关。电影检查制度就是这种大背景之下的产物。随着电影业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各种宽严不一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在世界各国先后出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差别，变化着其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本章主旨是透过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探讨电影检查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具体内容、实际运作、社会效果及其理论意义，以增进我们对电影此一20世纪最为世人欢迎的新兴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引起的社会反响之认识，同时亦增进我们对民国社会及社会生活之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背景

1896年，刚刚诞生不过一年的电影，漂洋过海，由外国商人带到了中国，在上海首次放映，被国人评为“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①。这样一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很快引来了国人的兴趣与商人的注意。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一些大城市中已经有了电影的商业性放映，最初的国产影片也

^① 《观美国影戏记》，载《游戏报》，1897-09-05，引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已问世。由于早期电影多为自然风光和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实录，而且是来自外洋的新鲜玩意儿，使久浸于传统艺术形式并且还不大容易迈出国门的国人得以直接领略到外部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当时国人对电影的感受以正面为主，推崇看电影“益处很大，无论那一等人常看，都可以增长许多的知识。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出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作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也正因为当时的影片是以自然记录为主，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还不大，因此论者将电影和中国传统艺术比较后，认为外国电影中“有许多道理，狠可以劝善戒恶，叫人警醒。余外还有那离奇古怪的片子，也可以开心散闷，人得了闲，时常看看，岂不比听戏强的多么？中国戏，小孩子们看了，坏处很多，好处极少，我也不必细说，明白点的人都知道。那些淫荡不堪的戏，最容易引诱坏了青年的子弟，不用说了。就是那好戏，也不免夹杂着邪说迷信，毫无道理，最能够锢蔽人心，人能把爱看戏的心，移在看电影上，管保他有益处”。再进一步，该论者甚至认为：“若是说看电影不如听戏，我敢说他一定是俗鄙不堪的人，他那程度还够不上呢。”^①如今看起来，这样的议论的确不无偏颇之处，但却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实为部分知识分子）对电影的好感，不似过去动辄视外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而予以鄙薄。^②但是，正是对电影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潜含的对于道德教化的期待，而一旦看电影不再有他们期盼的“益处”时，随中西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差异而至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电影的发展，故事片日渐成为拍片主流，电影不再是生活实录。故事片里既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反映，又有通过艺术方式表达的人生观、

① 《看电影大有益处》，载《大公报》，1909-02-05，第2张第2版。

② 有意思的是，清皇室自始即对电影放映表现出较为开明的态度。1904年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祝寿，及1906年端方自外洋考察宪政回国时，都曾在宫中“放电影自娱”，而且两次均因电机故障，发生炸裂，后一次还使在场的通判何朝桦等人因此丧生，但此后宫中放映电影并未因此种“不吉利”而被禁止。（参见《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10页；卞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8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价值观与文化观，而这些观念，不必说在社会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会引起争议，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差别而引起不同的反响。民国年间电影检查呼声的出现，就与故事片上映的日渐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国影片，占领了中国市场。此时正值美国开始流行连集侦探片，如《火车盗》、《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等^①，在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坏人，如强盗、暴徒及黑社会人物，都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以前亦未见过。坏人干坏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抢劫绑架，谋财害命，奸淫掳掠，杀人拒捕……宛如坏人展览会，描写得像英雄好汉，叫人眉飞色舞。侦探片好像坏事教课书，叙述得出神入化，使人兴趣盎然”^②。20年代早期，上海租界内“盗匪横行，白昼行劫，动不动开枪拒捕，掳人勒赎”，作案者自称是照电影学的。^③有论者谓：“自侦探长片输入而后，国内之盗劫偷窃之数，遂与此等影剧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术，亦即本影剧上传来之西方方法”。因此，“侦探长片实有百害而无一利”^④。论者将上海租界治安的恶化归于美国侦探片^⑤，但我们并未见到对其时上海租界治安

① 这些影片均为当时在中国上映时的译名，原名如何，今多已不可考。

② 程步高：《影坛忆旧》，38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③ 这些案件中尤以被搬上银幕的阎瑞生案最为轰动。1920年，上海某洋行买办阎瑞生，为图财害命，勒毙妓女王莲英。案破后，“阎瑞生在审讯时，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案件的本身，的确就是一部外国侦探片的翻版”（《影坛忆旧》，41页）。

④ 师毅：《影剧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原载朗华公司特刊第3期，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539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周剑云：《美国影片的两大劣点》，引自小可：《宣传与事实》，载《电影月报》，1919（7），7页。其时，天津警察厅已有训令给各警所云：“近今津埠盗案多乘摩托车行劫，推其原始，皆受电影之教诲。盖在电影未有此种影片之前，人民尚不知有此技术，自影片指导，遂以增匪之智，而变幻更日出不穷。盖演者以为神奇怪诞，可以藉广招徕，而观者惊为思议所不能及，不免因喜而生恶，研丧心术，败坏道德，玩视警章，紊乱秩序，莫此为甚”；要求“该管区署，严行检查，如有该项海盗淫淫之影片，仿即禁演，倘屡戒不悛，并即逮案，依法罚办”（《令取缔不良电影》，载《大公报》，1921-11-01，第2张第3版）。

⑤ 在美国本土，不少人同样认为，电影是“培养堕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学校”，“电影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影片内容不道德的居多”，等等，反映了宗教势力的道德观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也因此极力主张实行电影检查。（参见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10、5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情况的详细调查研究，因此租界治安的恶化是否为事实尚待考查，而即使此种恶化为事实，当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远非归之于看了几部作案片便起而效法如此简单。^① 不过从当时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们对于电影的关注及其处境迥异于他种艺术形式之现实。

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及其发展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因为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中国阴谋家”是美国银幕上常常出现的形象，这些人往往身材矮小，怪模怪样，在处理上，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常出现长辫、小脚、抽烟、吐痰等中国人的形象。时人论曰，这些片中“需用中国人处，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有意侮辱中国人，实足引起国际恶感”；“加之扮演者虽似我国人民，但泰半为他国人任之，故诬我尤深。即真有我国人任之，亦以久居异邦，对祖国社会情形不无隔膜，以之表演之事物，皆根据外人所作小说之理想，凡我国人士曾见此种影片者，无不认为耻辱”^②。因此，这些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抗议，斥之为“辱华”影片。近代中国由强而弱的地位变化，使国人对自身形象之海外反映备加关注，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民族主义情怀，则此一民族主义情怀贯穿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始终，并在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③

第一批国产长故事片的拍摄上映，在民国电影检查呼声的高涨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作用。1920年阎瑞生案发后，因该案有新闻价值，情节离奇曲折，其中之洋场妓女、恐怖谋杀、千里追捕直至最后凶手归案并遭枪决等情节，正是市民百姓之谈资。有眼光的生意人，纷纷用各种艺术形式，如新剧、说书等，将该案搬上舞台，票房甚佳。这也刺激了电影

① 人们对治安恶化的关注往往源于传媒的报道，而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个案的意义可能被放大，从而使受众得出今不如昔之印象。

② 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引自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南京，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改良中国影片事业之先声》，载《申报》，1922-08-22，第15版。

③ 1930年在上海发生的抗议上映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事件，促使上海电检会下令禁映该片，从而开禁映美国“辱华”影片之先河。（详见后章）



閻瑞生案图书

(五) 日三初月六酉辛曆華 (張二第報申)

了 天 一 有 祇

戲 影 生 瑞 閻

本社閻瑞生影片今朝已是第七天了
中外人士爭先恐後的賣光
異口同聲的讚美真是榮幸到
極點但是此片原定在本埠開
映祇有一禮拜因為北京天津
漢口等地方早已向本社訂
定預約現在各處拍雪片似的
信來催要去開映時不能挑選
了所以發給諸位記好從今天
起祇剩一天
止戲一元包樓一元半包院可
購余預定座位不多請各早
早臨

各種音景如大世界技院齊馬
汽車兜風北新運車田之夜景
地方槍聲砲火船機滿金山全
景泗水遠走徐州車站監獄內
之形勢龍飛躍軍使署等皆實
地實景說明書中西合璧乃
最新之白話文

每晚開演二次第一次七點鐘
起第二次九點半起共計十大
本一次演完

《閻瑞生》电影广告

从业者，1921年，中国影戏研究社将此案拍成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以真人真事为号召，“各种背景，皆实地真景”^①。上映后，“观者拥挤”，从7月1日至7日，连映7天，“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②。但是，《阎瑞生》一片虽获得了高票房，却因其写实性而被舆论批评，“在彼固以为揭发社会黑幕，使人警惕于中，实则迎合社会弱点，未见其警惕，反得其凶淫，何善之有”；“这类半写妓家猥褻的琐闻，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惟有海淫海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③。

1922年，民国年间最为知名的影片公司之一明星公司成立，其最初的制作《张欣生》一片使社会对所谓“不良”影片的反感更上层楼。与《阎瑞生》相仿，影片《张欣生》也是根据张欣生谋财杀父案的真实故事拍摄，并以此为吸引观众的号召。全片“俱就实地摄取，即演员之面相，亦必使与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实，剪接之合度，尤为是剧特色”。结果上映后，“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票房更超过《阎瑞生》，开映一周即达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演出场次。^④但该片尤甚于《阎瑞生》的，是出现了种种残酷镜头。据看过该片的著名电影导演程步高回忆，“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开膛破肚，把五脏六腑都挖出来，逐件剖验，事前用湿面粉仿制，涂墨水作人血，用特写镜头放大拍摄，看来真是恐怖吓人，肮脏起恶心。这是残忍肮脏的素材，用残忍

① 《阎瑞生》广告，《中国影戏研究社影戏尚演三日》，载《申报》，1921-07-05，第5、15版。

② 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源》，原载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引自《中国无声电影》，1327页。《阎瑞生》一片之影响遍及当时各大城市，甚至远及香港。（香港亦曾上映该片）而该片票房收入之好，使“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入华人之脑”（同上），从而直接刺激了国产电影业的迅速发展。

③ 醉星生：《银幕春秋》，原载《银光》，1926（1、2），引自《中国无声电影》，1316～1317页；又见《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18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电影史家过往对《阎瑞生》的评价一向不高，然新近研究不仅肯定该片作为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在艺术上的成就，而且认为影片“表达了善恶有报的传统性主题，对生活作出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判断和评价。因此，不能说影片在思想内容上完全是消极的”（《中国无声电影史》，68～69页）。

④ 参见《明星新摄之张欣生影片开映》、《张欣生影戏增加映演次数》、《张欣生影片映演之经过》，载《申报》，1923-02-19，第21版；1923-03-03、03-08，第17版。

肮脏手法去处理，而处理得亦相当残忍肮脏。小孩子看了要叫要哭，妇女们看了要逃跑，做恶梦。我亦看过，冷汗一身，使人不敢卒视，亦不忍卒视。……最主要的，对观众精神上、心理上、生理上、感情上，都起不道德、不卫生、不健康、不安静的坏影响”^①。因此该片上映后，不仅遭到舆论的批评，而且有人直接上书教育部，认为：“近日电影中于海淫海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阎瑞生沪上嫖徒，谋害妓女，业已伏法偿命，所谓厉气所钟，一任其灰飞烟灭，尚何取其人，写仿其面貌，揣度其心思，诚不知用意所在。然此尤可忍也。张欣生逆伦枭祖……而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夫电影原为娱情悦目之具，试问此类事实情有何娱，目有何悦，得之传闻尚当掩耳，而今竟争先快睹，则不啻制此片者之别具肺腑，即观者亦全无心肝矣。以上二影片可否函致警厅迅饬禁止，于人心风俗所关匪巨。”^②

主要是由于上述侦探、犯罪题材影片引起的负面社会影响^③，国内开始出现对电影社会效果的担心，从而引申出对电影施行检查的要求，其中又以教育界的态度最为积极。^④ 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开会，“曾议决取缔电影一案，所定积极消极两项审查标准，颇有可资参考之处”。1923年，江苏省教育会上呈江苏省省长公署，认为：“近年国内渐已自制影片，倘取材不慎，弊害尤多，即如阎瑞生、张欣生一案，皆已扮摄表演，此等影片皆取社会罕见之惨恶状况摄影流行，实不能收欣

① 《影坛忆旧》，70~71页。

② 嵩堃：《请禁止电影〈阎瑞生〉、〈张欣生〉影片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京政府教育部档（以下简称“二档”），档号一〇五七一—553。

③ 除了上述侦探、犯罪片外，由于东西方不同的性爱观，外国影片中对男女关系的描写也是国人注意的重点之一，曾有论者谓，电影“若流入男女爱情，则其伤败风化，较淫词小说为尤甚”（逯：《影片之宜取缔者》，载《大公报》，1919-07-05，第3张第2版）。但当时对于此点的反感与担心尚不及侦探、犯罪片。我们目前也还缺乏资料说明当时上映影片的性爱描写到了何种程度。曾有报道称，上海爱普庐影戏院上映的法国片《风流皇后》（*Atlantidl*）中，女主角“轻衣半裸，懒然偃卧软绒之中，屡作穷奢极欲之态，殊有伤于世风”（《各影戏院二月之回顾》〔三〕，载《申报》，1923-03-05，第17版）。但此处所谓的“轻衣半裸”更有可能是记者的形容词，而非电影的真实场景。

④ 在民国电影检查之滥觞期，有来自工商界的电影检查呼声，自此以后这种呼声则不多见，其间原因还待深入探讨。

赏感化之效果，本此一推，对于制造影片一事，苟非加以取缔，亦将为导恶源泉。为敢呈请鉴核，并案办理，以维风化，社会幸甚，教育幸甚。”^①接着，上海总商会和五马路商界联合会亦致电江苏省省长公署称：“影戏为人民普通娱乐之需，欧美各国最为通行。近年以来，沪上此类营业日益加繁，而人民嗜此者亦日众，果能将影片种类，严加选择，去劣留良，则人民于淑性陶情之中，可兼收易俗移风之效。无如影片来自外国，纯驳既不一致，而营业者为揣摩顾客心理起见，又专喜寻取奸盗邪淫之事实，以博庸众之观听，其有裨风化者，转居少数”；“沪上为各省商市中枢，物质文明甲于他处，而风俗之颓靡，道德之堕落，亦属冠于全国，识时之士，咸切隐忧。商界子弟，血气未定，鉴别力本极薄弱，若再以此等影片日渐灌输，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尽为其摧毁于无形”；“且此项影片，日渐通行，将来受其影响者，不仅沪上一隅，应请钧署据情咨商内务部，迅订检阅取缔之章程，颁行全国，以挽薄俗，并请于专章未经订定之前，先由钧署令行淞沪警察及江苏特派交涉员，于内地及英法两租界内，将有碍风化之影片，先行分别设法取缔”^②。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教化的关怀与民族主义情感是创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与各国电影检查制度的起源有着相当的同一性，而后者则源于中国近代的特殊环境。与宗教势力在美国电影检查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同的是^③，中国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首先来自于教育界。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过程中，受命负责电影“审核事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7月，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受教育总长监督，经费由教育部支给，并由教育部、学务局、京师警察厅指派人员参加，另聘京师大学校教职员、教育会会员及其他对于社会

① 《取缔有碍风化影片之呈请》，载《新闻报》，1923-04-08，第3张第1版。

② 《总商会电请取缔影片》，载《新闻报》，1923-03-18，第3张第1版；《函询取缔不良影片之情形》，载《申报》，1924-06-05，第13版。

③ 关于宗教势力与美国电影检查的关系，请参见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莱坞禁片史实录》。

研究事项有专长者若干人为会员，会长由教育总长指定，多少有些半官方机构身份。根据该会章程，该会戏曲股负责“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审核事项”。^① 由于该会成立时，电影的放映市场及社会影响尚不及 20 年代之广大，因此所谓“审核”云云自无从提起。而当电影放映逐渐普及，电影检查呼声渐起之后，由通俗教育研究会担当电影审查事项实为名正言顺。此外，由于该会在一些省份有分支组织，更便于其在广大地区内行使检查职能。1923 年 10 月，通俗教育研究会因“电影一项，近来风行各埠，影响社会较戏剧为尤深，其中所映影片有裨世道人心者固多，而诲淫海盗亦所难免”，因此“曾函警厅飭各影场，仿戏园之例，将所演戏目先期呈送”该会审核。1924 年 4 月，该会在致教育部的正式呈文中，认为“近日调查，最近所演影片有害最甚者二种，一为阎瑞生谋害莲英案，一为张欣生谋产案。二案虽系近年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不知制造影片者何所取意，而必取此种材料，演诸广场，以淆惑心理简单之人民，智识粗具之学子。喜其新奇，争先快睹，使此等残忍惨酷之状日接于目中，于人心播为风俗，其贻害于社会教育实非浅鲜。本会为防止流弊起见，拟恳咨行内务部通令所属一律严禁。再查此项影片系在上海租界制造，并请转咨江苏省长转飭驻沪交涉员，请领事团查取此项影片，即行销毁，以禁邪恶，而维风教”。教育部主管官员收到呈文后，批称：“咨行内务部查照办理可也。”^②

① 参见《教育部关于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呈并大总统批令》，1915-07-18，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文化分册，101~103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限于资料，作者目前对通俗教育研究会成员的具体情况，诸如年龄、出身、学历等等所知甚少。

② 《通俗教育研究会为禁止上演不良影剧呈并教育部批令》，1924-04-23，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文化分册，176~177 页。有论者称《张欣生》“遭到禁映”（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上册，69 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8），虽无出处，或来自于此。1924 年 2 月 24 日，浙江绍兴县知事接省长训示：“近日中国各埠戏园大都好为新奇，多演海盗之剧以取悦庸者，图营业之计，展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妨碍，如张欣生之谋杀案之类，近经上海众团体提称禁演映影戏并经内务部核准通令有案。”（陈华忠主编：《绍兴电影纪事》，6 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故《张欣生》曾遭“禁映”的说法不为无因。但同时亦有报道称，由于《张欣生》“备受各界欢迎”，致函影院“要求续映者亦颇不少”，直到 1924 年 5 月，上海还有电影院在放映该片，并于是月运往武汉放映。（《阎瑞生》片映于中国大戏院，载《申报》，1924-05-20，第 17 版）同时，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对《张欣生》一片也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详下文）。因此，该片是否确遭禁映或仅在部分地区禁映，尚待更多史料证实。